



“小”大子,走到最前面!

——一位共和国上将带领一家三代25人写书追忆“平凡母亲”

□ 本报记者 周娟

盐城市响水县昌盛村,是原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出生的地方,这位带着泥土的农家少年从这里出发,开启了半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

是怎样的家风,培养出一名共和国上将?11月9日,朱文泉与家人联袂写作的散文集《叶珍》专题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书中,能看到一个共和国高级将领的成长密码。

“叶珍”,是书名,也是朱文泉上将母亲的名字,朱文泉发动了一家三代25人,历时18年,通过100多个烟火故事,记录下母亲的一帧帧风貌音容。“崇耕尚读”“传承孝善”“自强向上”,每个故事都是一部朴素无华、直抵人心的家风教材,传递着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动产。

“小”大子,走到最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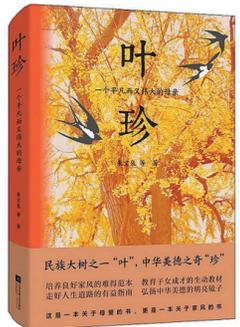
朱文泉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起初并没有名字,婚后,被人唤作“朱叶氏”。解放后,母亲觉得新社会来之不易,要格外珍惜,便为自己取名为“叶珍”。

虽然裹过小脚,没上过学,一生坎坷,但叶珍始终热情坚强,正直善良,是个“大智慧”的人。在人生很多个关键时刻,母亲朴素又富含哲理的话,如细雨润物,给朱文泉的成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能量。

1956年秋天,朱文泉考上响水中学,开学报到那天,他和七八个同学有说有笑地走在通往灌河口的河堤上,准备乘船前往响水,母亲从后面追上来:“小”大子,朝前面走,走到最前面!当时,年少的朱文泉并不太理解,长大后,他才慢慢明白母亲这句话不单指走路,更是勉励他树立远大志向。

朱文泉将这则箴言牢记在心,在学校争做领头羊,在部队争做刀尖子,从毛头小伙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共和国上将。这句“走到最前面”,也成为了朱家培养孝子贤孙的训诫。

家乡的一草一木,让耄耋之年的朱文泉魂牵梦萦,他印象最深的是老家的番茄,朱文泉在《摘茄子》中回忆:某日午睡醒来,一片绿叶子,在微风下来回摆动,小黄花在绿叶间时隐时现的景象吸引了他。年少无知的朱文泉把它们全扭了下来,后来被母亲发现,朱文泉以为肯定要挨打了。



民族大树之一“叶”,中华美德之“珍”。《叶珍》一书,是共和国上将朱文泉与家人联袂写作的散文集,记录了一位平凡母亲的音容风貌,传递着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动产。

“妈妈看出我的心思,弯下腰说:‘乖,别怕,妈不疼你,你还小,不知好歹。’稍许,又指着花蒂说:‘这个不能摘,摘了就不结瓜了。番茄是好东西,灾荒年能救人的命。’”晚饭,桌上多了一道菜,油炒番茄花。当父亲问起这些花的来历,母亲笑着帮儿子打马虎眼:“我们尝尝鲜吧!”

叶珍的智慧操持,充当着全家的“润滑剂”,虽然生活清贫,但感情甚笃。朱文泉上小学时,一直希望有个铁环,但父亲不允许,母亲对父亲说,“你买给他,他不就安心读书了嘛,你不买,他反而不好好念书”,同时,叶珍和朱文泉“约法三章”,不能耽误学习。

母亲无条件的接纳和包容,为朱文泉幼小的心灵刷上了爱的底色,成了他一生勇往直前的底气。

“给予是一种幸福”,这是叶珍在世时常挂在嘴边的话。上世纪60年代,叶珍从未被收割干净的黄豆秆中摘下不少黄豆,救济了周围的邻居,上世纪80年代,朱文泉一家移居城市,回乡给父老乡亲带了很多衣服和药品。母亲的勤俭与善良,是对朱家儿女身体力行的教育。

汇集25位亲人回忆的家风读本

“母亲走了,总也忍不住对她老人家思念,回想着一段段动人的故事……”
2003年1月5日,叶珍溘然长逝。

朱文泉悲痛万分,他与弟妹们商量,以文字来挖掘母亲留下的精神遗产。

朱文泉发动了一家三代25人,历时18年,写了100多个烟火故事,汇编成《叶珍》一书。其中,朱文泉写了13篇,次女朱文俊写了18篇。

“从2020年6月开始,至2021年3月计10个月,我停笔《金戈铁马》,全力以赴编撰《叶珍》一书,虽然飞蚊飘眼、鸣蝉挂耳,肠胃也经常闹点别扭,但每日5小时笔耕不辍。对诸亲文章则再次精推细敲,有的润色,有的补充,有的部分改写或大部改写,直至满意为止……”

从开始的几篇文章到如今30多万字,朱文泉觉得,写作的过程,也是重沐父母恩泽的过程,更是接受再教育的过程。叶珍的孙女婿李远未曾见过奶奶,但是从长辈们的文字中,他敬佩她“永不言累”的精神,“奶奶从早忙到晚,却积极乐观,带动着身边人都很乐观。”

江苏省委原书记李强从叶珍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母亲的影子。“他母亲曾对我说:‘小’大子,走到前面去!我母亲曾对我说:‘天上掉下东西来,也得靠自己去抢!’”两位母亲对儿子讲的话,意思大体一样,就是要努力,抢在前面。这些话,影响了我们一生。”

章剑华说,“家风是一个家族的精神不动产。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怎么样的家庭,就有怎么样的孩子。叶珍的母爱造就了一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母亲的言传身教,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为国家培育出一个栋梁之材。”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张健评价,《叶珍》一书写的是平凡的母亲,但也是千万伟大母亲的缩影,是传承家风家教的生动教材。

给教育界带来一堂生动的“德育课”

一位中国女性的日常生活史,也是一个家族的兴盛记录。《叶珍》以生动具体、清新润泽的回忆,展现了一位农家母亲的音容笑貌和博大情怀。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政协原主席张连珍阅读了数遍《叶珍》,她感慨地说,回忆是为了铭记,缅怀是为了感恩,铭记和感恩就要传承

和弘扬优良家风、传统美德。这本书表达的不仅是朱司令一家的事情,更是一本生动的家风教材。通过缅怀叶珍老人的感人事迹,更让我感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应该是双向影响的,子女孝顺父母,父母关爱子女。

“几位作者,虽不是专业作家,但写出了一般作家写不出的平和和质感,于平淡中现真滋味,有沁人心脾的力量。”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翟学伟说,书中,“弹棉花的过程”“猪油和油渣”“小瓦罐洗脸”“挣工分”等很多故事情节都充斥着年代感,让人笑中带泪。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李晓明说,“书中还原了很多非常美好细腻的情感瞬间,是宝贵的家族史的读本,也是特别生动的情感教育读本,我从25个作者的身上,感受到共同的精神气质——对人的温情,对物的温情,以及浓烈的家国情怀。”

“从《叶珍》中,能感受到朱家人对母亲久远的思念和敬重,能感受到一个共和国高级将领成长的秘密。”书香江苏阅读促进会会长韩松林说,“能感受到作者写作时,心中翻腾着一个共和国将军对社会、民族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一个年长者对新时代家风建设,对孩子们茁壮成长的热切期望。”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朱永新认为,《叶珍》的出版,给教育界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德育课”。十八年马拉松式的创作历程是一次教育的持久战,是一次把写作变成教育的过程,是一次让后辈在写作中走进前辈的精神世界的契机。书中很多感人至深的片段,不仅对当下孩子,甚至是后代子孙,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江苏省妇联副主席沈梅说,家家户户有好家风,就撑起了社会的完整的一个好风尚。这本书对我们当下家庭建设方面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能指导万千父母给孩子扣好第一粒扣子。

“道怀往事,是想告诉同学们:父母言,须在意,不能左耳进右耳出。父母是最早的人生导师。他们的叮咛,有深情、有厚爱、有期盼,是我们成长的营养剂、前进的动力源。”

在书中,朱文泉用秀丽工整的小楷撰写了一封致同学们的一封信,信中除了寄托对母亲的思念,更希望通过对家风的诠释,勉励青少年珍惜父母养育之恩,成长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同时,他也希望家长注重孩子品德教育,帮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首届高晓声文学奖颁奖后,一场重磅论坛再次聚焦——

乡村书写,如何回应“新山乡巨变”

□ 本报记者 冯圆芳

“近年来,关于新山乡巨变的书写层出不穷,被广泛认可的扛鼎之作却比较少,我们首先必须直面的,是乡土写作正陷入的困境。”11月12日,在由江苏省作协、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和常州市文联共同主办的“新山乡巨变与新乡村书写”主题论坛上,《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彤直言道。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这一时代语境正对文学发出召唤。论坛特邀首届高晓声文学奖得主和多位专家学者参加,期待能为弥合“新山乡巨变”与有效的“新乡村书写”之间的裂痕,集聚思路、智慧和必要的文学准备。

“不要主题先行、宣传口号,要人性的、想象的、文学的”

凭长篇小说《谁在敲门》获首届“高奖”的四川作家罗伟章,坦言“感觉乡土作品的生命活力正在变弱”。

“和路遥、张承志等前辈相比,现在的许多乡土作品比较‘软’和‘弱’,那种来自大地深处、生命内部的元气,那种使人物‘不得不如此’的力量,正在萎顿萎缩。许多作品推动故事依赖的是叙事策略,但作品里的‘人’是没有主体性的,故事席卷了人物,而不是人物创造了故事。当故事成为了主角,作品就必然丧失了‘人’的光辉。”

罗伟章还注意到,许多作品只紧盯“山乡巨变”的时代轮廓,却没有能力和耐心去发现生活的细部,无法让那些政治的、社会的元素转化为审美,也就无法文学地把握生活与时代的本质。“审美的力量来自细节,这是文学的重要规律。”罗伟章说,“作家们要多找找自己的原因,我们是否具备强大的主体性,是否拥有感知时代复杂性的能力?”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介绍,中国作协启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以来,收到了数百部投稿作品,遗憾的是佳作很少。“我们不要主题先行、图解政治、宣传口号,我们要人性的、想象的、文学的。”

把“主题创作”理解成“主题先行”,正是何彤梳理的乡土书写几大误区之一。“一些作家写出来的作品除了‘主题’对了,其他都是错的,这严重制约着主题创作的发展。”此外还有“现实感”的误区——或图解政策、粉饰乡村太平,或卖弄表面化的地方风土人情,或以流量思维对乡村进行博人眼球的奇观化处理。他提出,乡土书写不能回避巨变过程中的矛盾斗争,不能回避中间人物、负面人物,不能回避对人性的凝视、对问题的正视。

作家的“能不能”背后,首先是“愿不愿”。“现在的一些作家纷纷产化了,懂咖啡豆的比懂土豆的多,去乡村采风,宾馆住得不够高级都浑身难受,这样的作家怎么能写出真正的山乡巨变呢?”

追踪“新”和“变” 新乡村书写的既有成果在哪里

接踵而至的新现实、新经验,使“新山乡巨变”成为不断流动与生成的复杂巨系统。论坛上,与会者既盘点新乡土书写在哪些维度上有所收获,也分析在哪些话题上人们因困惑而思家踟蹰。

塑造新时代“创业史”中涌现的新形象、新性格,展现时代新人身上饱满的生命精神、创造精神,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光芒认为,这既是新乡土书写的阶段性收获,也是它应继续深耕的方向。几部江苏作家作品令他印象深刻:张荣超、谢昕梅的《我是扶贫书记》,塑造了扶贫书记李田野的形象,接续起以梁生宝(柳青《创业史》主人公)为代表的乡村创业者形象谱系;李海年的《大步流星》,讲述“兵王”唐海林服役期满后,放弃高薪聘请返回母校工作的故事,新时代退伍军人楷模形象呼之欲出;还有王大进的《眺望》,主人公唐小兰遭遇巨大的不公正待遇后,自勉自救、超

拔于苦难,体现了作家对农民、对底层的想象视野拓展。

以首届“高奖”获奖作品为例,南京作家余一鸣的中篇小说《湖与元气》借讲述大学生村官王三月的任职故事,来观察和表达对当下乡村治理的思考,并将对自然生态恢复的关注升华至对人性生态修缮的期许。

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重点关注青年作家的乡村叙事及其贡献的审美新质。“江苏作家孙频的《以鸟兽之名》,讲述了几个颇具悬疑色彩的‘寻找’故事,她耐心描写山林中的动物、植物、文物,全息呈现山林的微妙气息,美学上独树一帜;魏思孝以自己的家乡——山东的一座小村镇为中心,以田野调查和非虚构的路径,为熟悉的乡村男女‘作传’。还有曹跃辉,从他作品的‘返乡叙事’中能读出几分鲁迅《故乡》的调子,有的作品又直接将幻想与现实交融,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来表现对人类处境的悲悯和困惑。”

“新山乡巨变,重点是‘新’和‘变’,农民的观念、生活习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怎么样?但在追踪这种‘变’的时候,我又产生疑问:较富裕地区的新乡村、新农村,和城市、和市民的差别究竟在哪儿?”省作协名誉主席范小青困惑道。她认为,有差异才会有文学,找到农民之为农民的身份特殊性,是新乡村书写的起笔之点。

省作协副主席、苏州大学教授王尧返乡时发现,昔日村民生产日用的遗迹已被当作乡村文脉保护起来,欣慰之余,他以此推演:当代文学中的乡村形象,是作为密实鲜活的生活样态,还是作为供城市读者赏玩的风景?复旦大学教授邵元宝也表达了他的疑惑:乡土故事如何获得地方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融通,既写出本地读者熟悉的乡村和农民,又能够感染外地的读者,甚至被翻译出去,成为受世界读者喜爱的中国故事?

以“新乡土意识”扩容视野 文学回归个体也回归历史

新乡土书写的路径依托究竟在哪儿?通过这场论坛,一些基本的文学共识在凝聚。首届“高奖”得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沈念提出“建立新乡土意识”的观点,获得了与会者的共鸣。沈念解释,新乡土意识要求作家不囿于过去的经验,重新认识广阔无边的新现实,重新积累对历史、生命与情感的认知,重新认识乡土大地上人、乡村结构、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所发生的新变化,以一种平等、虔诚的情感姿态,塑造有精神底色、现实逻辑的新人物形象,既延续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又融入现代性的观念。

——乡土书写也可以很现代,这是《收获》主编程永新和中国作协副主席、省作协主席毕飞宇在读高晓声小说《钱包》(《鱼钩》)时,所共同感受到的审美惊喜。“我这几天总在思考,高晓声留下的文学遗产有哪些,我想到《钱包》(《鱼钩》),里面那些超越于具体的钱包和鱼钩之上的象征性的东西。你看,高晓声在他的外表很像农民的躯壳之下,埋藏了一颗向往现代性的灵魂,新乡村书写同样应当如此。”程永新说。

既要写出外在的山乡巨变,也要揭示人灵魂深处的秘密,中国作协创研室主任何向阳提醒,“记录时代”固然也是文学的使命,文学也要“向内转”,去解决人的精神、灵魂上的问题。

如果怀揣“史诗”的雄心去审视今天的新乡村书写——南京大学资深教授丁帆提到了自己不久前在《文艺报》上发表的观点,即“从历史链条看乡村世界”的书写逻辑:“周立波《山乡巨变》之所以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除了人性描写的艺术魅力外,还在于作者的历史思考的超越性。我们的作家如能观察到历史巨变中的深层话题,用‘第三只眼’穿透‘第四堵墙’,还乡巨变以真实的面貌,其文学史的意义一定是指向未来的。文学的‘史诗性’就是让作品一直活着,让它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王大的进《眺望》,主人公唐小兰遭遇巨大的不公正待遇后,自勉自救、超

《奋斗者——绳技蹬人》《炼——倒立技巧》勇夺“金菊奖” 奇“技”巅峰,讲好江苏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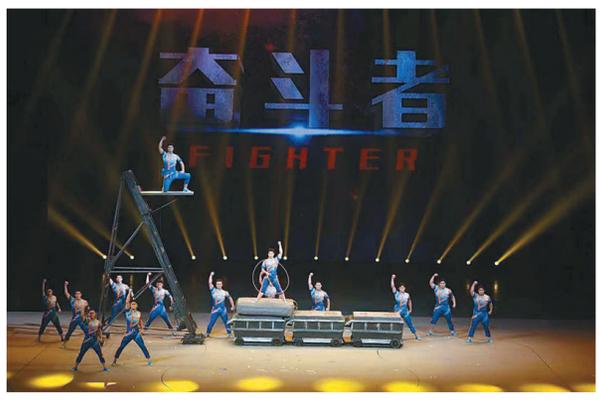
□ 本报记者 陈洁

经过五年等待,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本月13日正式揭晓。在10个获奖名单中,江苏杂技作品《奋斗者——绳技蹬人》《炼——倒立技巧》在全国70个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江苏杂技艺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精彩的展示窗口。

提起杂技,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高难度的技术动作。无论是南京市杂技团有限公司、南京市杂技家协会选送的《奋斗者——绳技蹬人》,还是江苏省杂技团选送的《炼——倒立技巧》,在“技”上都有独到之处。

杂技《奋斗者——绳技蹬人》是将绳技和蹬人进行融合的一种全新技术形态。绳技和蹬人是传统杂技技艺中两个单独的项目,南京市杂技团是全国第一个将绳技与蹬人进行创新结合表演的团队。这并不是简单的“绳技+蹬人”,而是叠加了很多的难度系数。处于上方翻转腾空的尖子演员在腾空旋转的那几秒钟绳子不能断开,处于下方蹬人接人的底座演员也要看准时机稳稳接住尖子演员。既要绳子翻过去,又要尖子演员腾空转身,还要正好和底座演员接上,这一连串的动作只要有一点偏差都完不成。

杂技《炼——倒立技巧》则是对“顶功”这一项传统技术的出色展示。腰、腿、顶、跟头是杂技的四项功,其中顶功被业界人士普遍认为是最难练就、最难保持、耗时最长,也是最显功夫和实力的项目。江苏省杂技团团长吴其凯透露,这个节目在江苏省杂技赛事中曾获得过金奖,此次参赛,主演



《奋斗者——绳技蹬人》

王梦尘在原有顶功节目的基础上进行了开发和升级,通过倒立技术与约2米高的杂技道具的融合,展示了俄挺等一系列高难度的技巧动作,即使是身强力壮、经验丰富的男演员也很少能够练成这套动作,特别是江苏省杂技团独创的单手倒立高台旋转跳技巧,展现了演员超强的平衡协调能力,表现出当代青年不畏磨难、努力拼搏的品质。

“技”固然是杂技艺术的核心。但面对今天观众的审美需求,从“技”到“艺”的突破,更难能可贵。

江苏省杂技家协会主席、南京市杂技团团长池文杰告诉记者,这次大赛经过层层选拔,共70个节目参加初

赛,经中国杂技家协会专家组评审,评出30个节目入围总决赛,经A、B两组4场比赛,最终决出10个杂技金菊。在参赛的作品中,不少是传统杂技技术的呈现,而《奋斗者——绳技蹬人》之所以能获得专家和评委的一致认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它的立意高远与脚踏实地。“我们的节目实实在在地在聚焦当代城市建设,通过刻画新时代奋斗者的青春群像,展示城市建设者们用勤劳和智慧担起城市‘钢铁脊梁’的使命与责任,诠释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价值和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的比赛是继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大量压缩奖项名额以来,举办的第二次金菊奖全国大赛,由于疫情之患,与上一届赛事整整相隔了五年之久。备战时间的延长,获奖名额的压缩,都无形中增加了这次比赛的焦灼程度。用吴其凯的话来说,这一届金菊奖比赛是准备最充分、作品质量最高、竞争态势最激烈的一次赛事,也是精品迭出、精彩连连、振奋人心的一次赛事!

“2018年,我们以渡江战役为题材创作了国内首部红色杂技剧《渡江侦察记》,2021年再现南京长江大桥建设过程的杂技剧《桥》也是首部题材杂技剧。”池文杰介绍,中国杂技艺术已有3000多年历史,杂技剧正是对传统杂技表演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考和实践。而此次获奖,也是该剧继2017年杂技《西游记——跳板蹬人》、滑稽节目《热人心》后第三次斩获“金菊奖”。

而在吴其凯看来,无论是取材于华中鲁艺抗战历史的杂技报告剧《芦苇青青菜花黄》,还是他们打造的诗词歌赋杂技剧《小桥流水人家》,不仅赋予了杂技讲好江苏故事的能力,也让杂技演员“长功”,增加了技巧和难度之外的对于角色塑造的能力,而这样的磨砺,也让演员在比赛时更有感染力。

16岁女孩王梦尘告诉记者,她从4岁开始练习杂技,每天6到8小时用于练习,12年来坚持不懈在做同一件事。“我们每个人都是飞速运转的机器中一颗颗小齿轮,虽然个体力量很小,但只要不畏磨难、努力拼搏,就能转动命运之轮,留下永恒的时代印记。”这是她的获奖感受,也是江苏杂技不断“攀高”的动力和源泉。